

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及其发生根源探析

——基于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

杨磊¹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的影响引起了广泛争论,形成了市场效率和小农理性两种具有张力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发现工商资本下乡具有增长效应、分化效应、排斥效应和断裂效应,基层政府、工商资本主体和大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排斥了普通农户参与的经济机会,给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稳定性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些效应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基层政府在政策资源分配时具有“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性,而资源禀赋不足的普通农户则坚守着“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结果便是普通农户与工商资本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失衡。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既要利用工商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转型,也要重视小农经济的内生发展,充分保护农村社会“蓄水池”的承载功能。

【关键词】资本下乡 多维效应 农民分化 小农理性

【中图分类号】:F 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9)06-0106-08

工商资本下乡最早出现在广东、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农村近年来也有大量的资本下乡现象,工商资本已经进入我国农业生产的各个行业和领域,在乡村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伴随着国家部门资源大规模下乡和“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拉开序幕,资本下乡的速度、规模将会前所未有的,工商资本是新时代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引擎。在资本下乡的要素驱动之下,农村地区密集地出现了土地流转、土地银行和龙头企业等新现象和新事物,工商资本涌入农村在释放了社会发展的新活力、促进农村治理模式朝着新形态演进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诸多新矛盾和新冲突,给农村治理的稳定性和有序性带来挑战。因此,资本下乡具有复杂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需要加以微观化、系统化的研究,为有序引导资本下乡、充分保护农民利益和合理地以产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启示。

一、文献回顾:工商资本下乡的效率之争

工商资本下乡是一种城市的资金要素进入农村,驱动资本与农村的土地等要素结合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现象。作为一种“自外而内”的乡村发展模式,以现代农业公司、较大资本和规模的农业生产者等工商资本主体为主导的外源性发展路径在中国乡村发展和农业经营的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着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争论。

¹**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权变革背景下农村治理转型与机制创新研究”(17CSH009)。

作者简介:杨磊(1988-),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城乡发展与基层治理。

第一,农业资本化效率与利益冲突的争论。在农业经济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以资本改造传统农业的市场学派和以舒尔茨、恰亚诺夫等为代表的强调尊重小农理性和组织小农互助的小农学派间的争论,国内学者对工商资本下乡的研究受到了这种争论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学派认为资本下乡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资本下乡有利于改造传统农业,龙头企业将分散的农户整合进产业链条之中,资本和土地的结合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农业价值^[1];资本下乡实现了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专业合作社提高了农户组织化程度,而资本主体和农户能够新的生产体系中构建起利益分享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公司和农民的共赢^[2-3]。另一方面,小农学派则认为农业资本化的效率要远远低于家庭经营。对小农家庭代际分工的分析表明小农家庭内部的精密化分工兼具发展性和稳定性,资本下乡推动的规模化经营无法实现预设的效率,资本对农业剩余价值的掠夺反而侵害了农民的利益^[4]。工商资本主体更多的是为了获取国家各类惠农政策补贴,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主体没有从直接的农业生产中获得利润^[5]。效率学说的支持者认为农业资本化能够缩小城乡差距,资本下乡促进了双向城乡一体化^[6];小农经济学派则认为过度的农业资本化破坏了农村“稳定池”的功能,资本下乡具有将农民推向“强制商品化”的风险^[7]。

第二,农业资本化效率之争向乡村治理的延伸。不少学者通过对沿海地区资本下乡的调查发现,资本下乡实现了农村治理主体的结构性演进,“公司型村庄”的治理样态正在形成,这种治理样态具有内在的效率机制和稳定性^[8]。然而,不少资本下乡的案例表明,在部门下乡与资本下乡的过程中,专业合作社往往容易发展成“大农吃小农”的合作社,这不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会对农村治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9]。在中西部不少农村地区,资本下乡是地方政府依托弹性土地政策和财政专项资金推动的结果,政府和企业通过合作实现对村庄的“经营”和“再造”,这对村庄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农村越来越依附于公司,公司替代村庄成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10]。资本下乡对乡村治理的冲击来源于农业资本化情境下政、商、村、农等主体利益间的非兼容性,容易形成“权力-资本”的利益共同体,农村集体治理机制不能够保护农民利益,资本下乡出现了与农争利的负面效应^[11]。

第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工商资本下乡的风险。从工商资本与农村社会结构的关系角度来看,外来资本始终无法克服与乡土社会互动不畅的难题,这是由其“外来性”的特征导致的^[12]。工商资本在面对复杂的农村社会环境时,不得不吸纳非正式权威来推动土地流转,这既侵害了农民的权益,又增加了村级组织的政治风险,消解了村级组织在治理中的权威性和公共性^[13]。资本下乡中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等三个环节,植根于乡土社会中利益分配规则的模糊性^[14]。在城乡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下乡存在政策推力、农村拉力和内生动力三重生机制,带来了阶层再造、农业质变、村庄虚化以及“三农”发展“内卷化”的意外后果^[15]。资本下乡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是普遍现象,工商资本主体侵害农民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学者对资本下乡的研究也存在着市场效率和小农理性的价值争论,着重探讨了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民利益保护和农村治理带来的风险等问题,缺乏对资本下乡的效应及其根源进行微观化研究。本文在市场学派和小农学派对资本下乡效率等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在湖北省Y县开展的调查,利用微观案例、访谈资料和农民收入变化数据,进一步扩展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客观地描述和归纳资本下乡带来的多维效应,探讨这些效应对农民利益和乡村治理带来的影响;第二,深入探究资本下乡多维效应产生的根源,为有序地引导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乡村内生发展提供启示。

二、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对Y县的实证调查

湖北省Y县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柑橘种植基地,柑橘产业是当地乡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产业发展模式经历了分散种植到龙头企业引领建立规模化种植基地的转变。近年来,当地通过引进工商资本和现代农业公司等开展市场化经营,柑橘产业由成熟果销售向深加工、乡村旅游等二、三产业延伸,资本下乡促成了Y县以柑橘产业为主导的农村多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2016年7月,笔者所在课题组在Y县开展了以“产业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为主题的调查,获得了6个村366份关于农户收入情况的有效问卷,用来分析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

1. 研究设计和整体描述

Y县不同乡镇、行政村的柑橘产业化水平并不相同,工商资本下乡的主体、规模和形式具有一定差异:第一,工商资本的主体不同。工商资本主体包括外来城市工商资本和本地工商资本两种主体,他们在柑橘产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工商资本下乡的资金规模不同,外来城市工商资本主导的龙头企业在资金投入规模、土地流转面积等方面要大于本地工商资本主体;第三,农户参与资本经营的方式和利益联结机制不同。Y县的农户可以通过与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示范基地、经纪人等主体联结实现与柑橘产业发展对接,而利益联结方式则包括订单收购、企业务工、土地入股等三种主要方式。在考察资本下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时,问卷设计时区分了外来城市工商资本主体和本地企业家、种植大户的资本主体两种类型,且把参与了产业发展对接方式和利益联结方式中的任何一种类型的农户判定为参与户,没有参加任何一种类型的农户判定为非参与户,问卷内容列出了柑橘种植户2015年的各类收入与支出。

为了更好地揭示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按照工商资本主体的性质、资金投入规模和土地流转面积以及农户参与率等三个维度的标准,在研究中将6个行政村划分为“小规模资本下乡组”和“大规模资本下乡组”两种类型,具体情况见表1。这两组农户数量分别为192户和174户,较大规模样本能够保证比较分析的科学性,6个村的366户农户平均参与率为0.31,通过比较“小规模资本下乡组”和“大规模资本下乡组”农户收入的差异,来判定和说明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并通过访谈进一步搜集经验性知识来揭示更多微观细节。

表1 不同规模资本下乡组的基本情况

资本下乡的类型	行政村范围	特征比较
小规模资本下乡组	调查农户包括桥村、头村、岗村和陈村等4个行政村192户农户	该组别的柑橘产业化以本地企业家、能人成立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为主体;资金投入规模相对较少、土地流转面积较小;农户的参与率分别为0.27、0.21、0.31、0.30。
大规模资本下乡组	调查农户包括战村、溪村等2个行政村174户农户	该组别的柑橘产业化以外来农业公司为主体进行规模化种植,建立起柑橘加工厂,投资规模较大,整村流转了两个村的承包地(旱地)和山林;农户参与率为0.44、0.45。

注:行政村名称根据学术规范进行了处理,具体信息根据问卷调查和访谈整理而来。

2. 资本下乡多维效应的表现形式

第一,资本下乡的增长效应。在Y县6个村调查时发现,资本下乡规模越大的村,柑橘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越高,农户平均收入也就越高。按照工商资本下乡的主体、规模和农户参与率,把这6个村划分为较大规模资本下乡组和较小规模资本下乡组等两种类型,调查农户数分别为173户和198户,表2为不同规模资本下乡组农户平均收入情况。根据表2可以发现,大规模资本下乡组农户平均总收入是小规模资本下乡农户平均总收入的2.24倍,四种类型单项收入比分别为2.95、1.12、0.86、4.24。来自农户收入变化的数据表明,资本下乡促进了农户收入增加,具有明显的增长效应。资本下乡增长效应还表现为乡村经济的发展,这源于资本下乡带来的资金、技术等要素改变了农村资源禀赋条件,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了资本要素与农村土地等要素的整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在效能,促进了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市场化和产业化水平。一方面,工商资本主体和柑橘种植大户等利用外源性资金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产业形态由单一的种植销售向多样化的深加工、生态农业转变;另一方面,规模化种植和经营实现了乡村社会主体的再造,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职业农民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出现,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普通农户组织化分散的问题。

表2 两种资本下乡规模的农户平均收入情况 千元

资本下乡类型	经营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总收入
大规模资本下乡组	73.59	15.05	2.48	2.88	94.00
小规模资本下乡组	24.97	13.49	2.90	0.68	42.04
两者收入比	2.95	1.12	0.86	4.24	2.24

第二,资本下乡的分化效应。资本的分化效应集中表现为在农村社会主体结构变迁中不同主体经济收入和地位的分化,高度均质化的小农经济形态被打破,规模化经营中出现了少数乡村经济精英。这种分化效应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农户经济收入的分化。从表2农户收入情况看出,大规模资本下乡组农户的经营性收入是小规模资本下乡组的2.95倍,两种资本下乡类型下农户其他收入差距也比较明显。进一步计算两组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不难发现大规模资本下乡组农户内部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小规模资本下乡组,小规模资本下乡组农户收入基尼系数较低(见表3)。其次,国家项目资金对接能力的分化。资本下乡密集的地区国家项目资金支持更丰富,以村组干部、乡村经济能人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更容易争取到国家项目资金的支持。最后,不同的乡村社会主体与工商资本主体对接能力的分化。乡村精英既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带头人,又是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早期实践者,更容易与龙头企业建立起利益共同体,工商资本主体往往通过乡村精英推动土地流转,而其他农户则与工商资本主体缺乏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16]。这些分化效应表明,资本下乡过程中不同农户对资金、技术以及土地等要素的整合能力不同,少数农户掌握了资本下乡带来的经济机会和经济优势。

表3 不同规模资本下乡组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情况

资本下乡类型	农户收入基尼系数
大规模资本下乡组	0.53
小规模资本下乡组	0.42

第三,资本下乡的排斥效应。资本下乡的排斥效应表现在工商资本在规模经营中具有较大的强制性,对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农业生产者产生了排斥。在对两组农户收入数据进行五等分的基础上,将第一、二组合并为低收入农户组,第四、五组合并为高收入农户组,第三组为中等收入农户组,得到不同收入农户占全部农户数量的比例(见表4)。可以发现,小规模资本下乡组平均收入以下农户比重较低,中等收入农户比重相对较高;而大规模资本下乡组平均收入以下的农户比重较高,中等收入农户比重相对较低,这就是资本下乡排斥效应的结果。在资本与土地要素结合的过程中,中农和老农等主体被排挤出农业生产过程^{①[17-18]}。资本下乡的排斥效应具体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第一,工商资本主体大规模地流转土地,农村自发流转土地的社会基础遭到侵蚀,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把土地流转到龙头企业和大型专业合作社。第二,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资本和项目资金支持的优势,不断改善农业基础条件、提升专业化种植水平,使得他们的农产品竞争优势更为明显。第三,由于工商资本主体和地方政府主导推动土地流转,中农和小农被排挤出农业生产过程。在土地流转中,资本和权力主体有联合的内在驱动力,在不尊重农户意愿的情况下,工商资本主体强制地流转农民土地,破坏了中农自发流转的中等规模农业、老农的兼业农业等多样化的农业样态。

表4 不同收入群体占总农户数量的比例情况

资本下乡类型	低收入农户占比/%	中等收入农户占比/%	高收入农户占比/%	平均收入以下农户占比/%
大规模资本下乡组	0.33	0.45	0.22	0.55

^①①西方农业发展学者亨利·伯恩斯坦根据农业生产规模和资金投入将农业生产者划分为农业企业生产者、大规模农业生产者、中等规模农业生产者和小规模农业生产者。按照贺雪峰、杨华等学者的研究,“中农”是指流转30~50亩土地发展适度规模农业经营,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家庭生活完整、收入水平不低于外出务工家庭的农民群体;“老农”则是年龄在60岁以上,利用闲暇时间发展小规模农业经营和兼顾农业副业生产的农民群体,请参见文献[17]和[18]。

第四,资本下乡的断裂效应。资本下乡的断裂效应是指工商资本主体在发展规模经营的过程中缺乏与普通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从而使得小农利益与乡村发展断裂的现象。这种断裂效应在实践中具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小农与大生产、大市场联结的断裂。Y县在柑橘规模化、产业化种植中始终面临着难以组织普通农户参与产业经营的问题,由现代农业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成立的合作经济组织,无法解决普通农户在农业经营中生产性基础设施薄弱和社会化服务短缺的难题,致使在大规模土地流转后不少农户直接退出了柑橘种植。第二,工商资本主体与普通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的断裂。Y县虽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选择了“保底分红”的模式来保护农民利益,但农户和工商资本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系依旧极为松散,除了少部分农户被雇佣到农业公司之外,大多数农户与工商资本主体缺乏充分整合。第三,公司治村或富人治村局面下的小农参与断裂。伴随着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农村社会主体的再造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结构,现代农业公司、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等主体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在Y县资本下乡规模较大的村,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公司治村”或“富人治村”的局面,乡村发展高度依附于资本主体和少数经济精英,这些主体以其在乡村社会强大的行动能力,主导了乡村政治和治理的基本过程,谋求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直接打击了普通农户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

三、工商资本下乡多维效应的发生根源

工商资本下乡是世界农业现代化中的普遍趋势,资本和土地的结合必然会引起诸多经济、社会和其他方面的效应,对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有序性构成了巨大挑战。来自湖北省Y县的调查和研究表明,资本下乡多维效应隐匿着复杂的社会影响,这些影响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的,不仅与工商资本内在属性具有关联性,还与基层治理、乡村发展中的具体场域有紧密联系。

1. 基层政府“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

在资本下乡过程中,基层政府并非简单地遵循经济逻辑,而是具有复杂的治理逻辑和政治逻辑,资本下乡所具有的规模效应和增长效应完成了基层政府的农业经营及其治理任务^[19]。在Y县的柑橘产业化过程中,基层政府具有明显的“抓大扶强”行为特征,即存在着扶持大型龙头企业和建立大规模农业产业示范基地或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等价值追求。基层政府通过抓大项目大企业、扶持大合作社大农户等手段,集中力量整合要素资源打造区域内农业产业化的样板工程。在引导资本下乡的治理实践中,基层政府建立起了一套“抓大扶强”的工作方法,核心在于灵活运用国家和上级政府各类涉农财政项目资金,将财政项目资金和工商资本整合起来,发挥资本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功能。这种逻辑可以从对Y县农业部门的访谈发现:

“产业发展追求规模效应,这几年我们县里一方面加强涉农项目的招商引资,另一方面整合了一些项目助力柑橘产业发展,提出国家级柑橘示范基地的发展目标,扶持了两家柑橘加工企业,以柑橘产业为抓手撬动整个现代农业发展,建立柑橘现代产业示范镇、村。”(20160723, YD01)

这表明,Y县政府在柑橘产业发展中具有明显的能动性:一方面,充分挖掘和整合区域内的特色农业资源,向国家和上级政府的各个涉农部门争取财政项目资金;另一方面,主动引进大型龙头企业,与各类农业资本主体合作建立农业产业基地,引导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各类国家项目资金进行捆绑和整合,把这些资源集中地投入到龙头企业、大型专业合作社和新型职业农民等主体上,实现区域内单个农业产业、少数涉农龙头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的目标。在Y县调研中,当地农业部门反复提到这样一种农业产业化道路:

“过去农业部门搞产业发展喜欢撒胡椒面,但实际上效果非常有限,一个县农业发展需要塑造出一个主导性产业,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做出品牌,再借由工商资本主体纵向发展,逐步示范、带动农民增收。”(20160724, YD02)

在治理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基层政府这种价值追求既是无奈之举也是理性选择,“抓大扶强”方式能够迅速促进资本与农村土地等要素的结合,在最短时间内发挥工商资本对农业农村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的积极作用。然而,这种农业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负面效果,国家项目资金的分配未能惠及普通农户,财政资金过度倾向于资本主体导致了资源的浪费,而农业内源性增长的动力不足,政府“输血式”的农业产业化道路面临着诸多风险。由于缺乏持续性的增长机制,不少农业产业示范项目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未能发挥“以点带面”“以大帮小”的作用。Y县战村一位柑橘种植户在访谈时说道:

“村里引进的柑橘企业,要是没有国家项目扶持,难以维持;它把全村大多数土地都流转过来了,像我们这种零散的柑橘种植户也主要是靠外地贩子,平时在种植、管理过程中也是靠自己的经验。”(20170724, YD03)

从对Y县战村其他零散的小规模柑橘种植户访谈中发现,普通农户未能获得国家财政资金的扶持,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利益纽带非常脆弱,又因弱势的经济地位而无法与大资本、大市场联结,甚至在不少地区出现了专门靠套取国家财政资金补助的资本下乡现象。因此,基层政府“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是资本下乡多维效应的治理根源,这种逻辑塑造了资本下乡现象的制度激励结构,对不同农业经营主体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也为工商资本主体与基层政府的单向合作提供了条件。

2. 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行动逻辑

在Y县柑橘产业发展中,龙头企业和资本型合作社是资本下乡的重要主体,这些主体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具有两个明显的行为特征:一方面,通过与基层政府、村组干部以及其他乡村精英的合作,尤其是借助基层政府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治理目标,大规模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另一方面,推动实施农业产业化示范项目,通过这些项目争取基层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实现龙头企业推动的项目和国家各类涉农项目有效对接。工商资本主体的行为特征表明,“强势分利”的行动逻辑在于:龙头企业、资本型合作社利用工商资本整合土地要素并参与财政资源的分配,获取更多的经济机会和经济优势。这可以从某柑橘企业负责人访谈中发现:

“县里面对我们企业有很多政策扶持,尤其是在打造国家级柑橘产业示范基地这项工作上面,我们计划在各村成立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再把这些专业合作社联合起来成立合作联社,县里出台了合作社扶持奖励办法。”(20170705, YD04)

Y县溪村、战村以外源性工商资本主体下乡为主,这种强势分配的逻辑非常明显,这导致了在土地要素、财政资金和其他政策支持等资源分配中“以大吃小”的分化效应出现。

在农民资本实力弱小和农村资源禀赋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不仅仅是由资本的内在属性决定的,也与国家涉农财政转移支付项目的运行机制有较强关联。“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是资本主体和基层政府双方合作的结果,基层政府要推动各种农业项目落地,只能选择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资本主体合作,这既能实现农业产业化的经济效应,又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与分散农户合作的交易成本,快速地打造出一个农业现代化的样板。

在Y县的田野调查表明,在农村社会内部逐渐衍生出套取国家财政资金的各类工商资本主体,一些掌握村庄治理资源的村组干部或部分与龙头企业联系紧密的大户,利用多个专业合作社的发起人或家庭农场的举办者的身份,争取各类惠农资金;然而这些资金却没有充分高效地投入到农业经营之中,工商资本主体和大户在国家资源分配中形成了一种结构化的“分利秩序”格局^[20]。Y县桥村一位农户在访谈时提到:

“村里有一位柑橘种植大户,他是前支部书记的儿子,成立了柑橘种植合作社、柑橘种植家庭农场,利用国家资金建立了三个柑橘保鲜冷库、柑橘打蜡厂,采摘加工忙季可以在那里做零工,但其他农民采摘后的柑橘到他那里保鲜、打蜡需要收钱,国家项目款普通老百姓享受不到。”(20170726, YD05)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经济逻辑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强化工商资本主体和少数大户之间的利益联系,带动部分农户收入的增长,但却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分化效应和排斥效应。在这种利益格局之下,普通农户普遍缺乏参与农业产业化的内在动力,加之这些资本下乡项目本身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普通农户参与的经济成本和风险成本会进一步增加,最终导致资本下乡项目和普通农户之间纽带的断裂。

3. 普通农户“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

中国农村社会虽然已经嵌入高度开放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体系之中,但农民经济的本质仍然是小农经济,社会性小农是小农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21]。在资本下乡的作用机制下,Y县的柑橘种植村虽然出现了与市场联结密切的农业大户,但经营规模和产业化水平都相对较低,工商资本主体面对的依然是组织化分散的小农。普通农户在农业产业化道路过程中遵循着“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一方面,小农依托家庭内部分工构建起“半工半农”“半城半乡”等经营模式,老龄劳动力在农村维持基本的生计,年轻劳动力则进入城市赚取现金收入^[22];另一方面,普通农户利用农村社会现有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自发构建起多种形式的非正式合作机制,并在农业生产和经营中发挥这一机制的积极作用。对Y县溪村的某村干部访谈时,他说道:

“我们村大多数村民都将土地流转给柑橘企业,也有不少分散的柑橘种植户,但规模都不大,(因为)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工(劳动力不足);种植柑橘的收入不稳定,风险还比较大,柑橘种植企业、村里也都号召大家种植柑橘,但积极性都不高,主要是留在家里的妇女、老人种植一些柑橘,作为增加收入的副业,收获忙季大家相互帮忙采摘。”(20170727, YD06)

因此,小农经济的内在弹性和家庭生产效率,与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具有明显的张力;普通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经营内在动力的缺乏增加了工商资本主体组织农户发展规模经营的交易成本。当基层政府与工商资本主体合作以求策略性分配国家资源时,普通小农自然会被排斥在各类产业开发项目之外。在资本下乡的过程中,普通农户“小农理性”的社会基础正在遭到瓦解,小农面临着被半强制性地走上农业产业化、市场化以及商品化道路的诸多风险。

在Y县的田野调查还发现,基层政府在“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支配下,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强制推动土地大规模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些发展手段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农村自发发展起来的“中农”在农业产业化中逐渐消失了,这些中农依靠自发土地流转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对农业生产进行了长期投资,而工商资本进入农村之后,大规模流转打破了这种自发秩序,中农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被挤出^[23]。Y县战村曾经的柑橘种植户在访谈时说道:

“我过去在村里种植了50多亩柑橘,都是别人外出打工不种了低价流转给我,后面县里打造柑橘示范基地,搞整村土地流转,农民纷纷把土地流转给公司,我也就很难再搞下去,过去在这些柑橘种植上投入了不少钱,外地老板搞的土地流转让我连投资的本钱都没收回来。”(20170727, YD07)

另一方面,打破了普通农户家庭内部“半工半农”的分工机制,土地流转虽增加了农户的财产性收入,但在农业兼业的自发样态被打破后,普通农户尤其是老年劳动力在高度市场化的社会面临着生活成本激增的压力,农村社会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老农贫困化现象;在Y县整村流转土地种植柑橘的地区,普遍地存在着“老农”生计维持困难问题,引起了他们对柑橘企业的激烈反抗和不满。这可以从战村一位老农的访谈中发现:

“自己有地还可以种点粮食和蔬菜,土地流转后我们只能拿一点租金,但这点租金根本不够花费,样样东西都要靠钱来买;我们向村里、镇里多次反映了这个问题,希望提高每亩土地的租金,不行就要把土地收回来。”(20170726, YD08)

这两方面的影响是资本下乡分化效应和挤出效应的社会根源,当普通农户和中农被排挤出农业生产经营时,在缺乏必要社会支持和经济保障机制的背景下,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持续演化以及向农村社会内部的延伸,中国农村的发展路径将会由没有失地农民出现的农业资本化朝着有农业贫困人口农业资本化转变,这将会对农村治理产生重大影响^[24]。

四、结论与启示

在已有的学术研究中,过于强调资本下乡的某种单一效应,缺乏对资本下乡多维现象及其根源的深刻理解。来自湖北省Y县的调查表明,资本下乡具有非常广泛的综合效应,资本与其他要素的组合带来的增长效应、分化效应、排斥效应和断裂效应相互交织。

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是基层政府的价值追求、工商资本主体的经济逻辑和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农业经营的具体实践中,这些效应对农村社会的长期影响还需要持续观察,既要挖掘农业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下资本下乡的示范带动作用,也要注意在既定基层治理结构和社会情景下资本下乡所隐匿的风险。

对资本下乡多维效应及其发生逻辑的探讨回应了市场学派和小农学派之间的价值争论,发现了多维效应产生的经济、治理和社会根源,对小农经济的资本主义转型或内生式发展两种观点进行了新一轮讨论。“自外而内的资本下乡”发展道路解决了乡村发展资金要素不足的难题,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充分整合农村土地等诸多要素,面向市场的规模化经营能够激发农村要素的经济效能。

但是,工商资本的外源性无法充分地组织小农,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场域中甚至出现了资本排斥普通农民的现象,在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过程中,工商资本主体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性资源。那么,如何弥补“自外而内的资本下乡”发展道路的缺陷呢?这就需要“自内而外”地把普通农户充分地组织起来,从乡村内部培育起有一定资本投入的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破除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服务等公共产品薄弱对小农发展的限制,通过村社间的互助合作走向联合,将更多政策性资源惠及普通农户,发展面向市场的适度规模经营和特色农业,以渐进式积累方式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把“自外而内的资本下乡”和“自内而外的渐进式积累”两种发展道路充分地结合起来。

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工商资本下乡对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转型的推动具有重要意义,能够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固化背景下乡村资本缺乏的难题,实现资本、土地、技术以及其他资源要素的整合,给农业和农村社会发展注入活力;但在引导工商资本进农村时,应充分地尊重农民土地流转的意愿,不能激进地、强制地推动农业规模经营。

与此同时,也应注重农村社会小农和中农的内生发展,通过国家政策资金股权化、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式,为普通农户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供外部支持,增强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生实力;在政策资源分配的过程中,着力解决惠农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让农民真正能够分享到农业政策红利。

在推动工商资本进农村时,应广泛地探索多元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以农村多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引领农业产业化发展,打造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业态,将龙头企业、合作社、村集体和农民打造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构建起多主体内生合作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最后,充分利用“小农经济”的保障功能和农村社会“稳定池”的承载功能,防止工商资本与土地结合时出现严重的分化现象,避免农村社会分化对农村治理带来重大挑战和冲击。

参考文献:

- [1] 陈义媛. 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积累[J]. 开放时代, 2016(5):92-112.
- [2] 郑风田, 程郁. 从农业产业化到农业产业区——竞争型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可行性分析[J]. 管理世界, 2005(7):64-73.
- [3] 胡冬生, 余秀江, 王宣喻. 农业产业化路径选择:农地入股流转,发展股份合作经济——以广东梅州长教村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10(3):47-59.

-
- [4] 贺雪峰. 小农立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 [5] 王德福, 桂华. 大规模农地流转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分析——基于皖南林村的考察[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2):13-22.
- [6] 罗来军, 罗雨泽, 罗涛. 中国双向城乡一体化验证性研究——基于北京市怀柔区的调查数据[J]. 管理世界, 2014(11):60-69.
- [7] 孙新华. 强制商品化:“被流转”农户的市场化困境——基于五省六地的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5):25-31.
- [8] 郑风田, 阮荣平, 程郁. 村企关系的演变: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J]. 社会学研究, 2012(1):52-77.
- [9] 仝志辉, 温铁军. 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兼对专业合作社道路提出质疑[J]. 开放时代, 2009(4):7-28.
- [10] 焦长权, 周飞舟. “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100-116.
- [11] 曹俊杰. 资本下乡的双重效应及对负面影响的矫正路径[J]. 中州学刊, 2018(4):44-49.
- [12] 杨雪锋. 资本下乡:为农增利还是与农争利?——基于浙江嵊州S村调查[J]. 公共行政评论, 2017(2):67-84.
- [13] 冯小.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以“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14(2):2-8.
- [14] 李云新, 王晓璇. 资本下乡中利益冲突的类型及发生机理研究[J]. 中州学刊, 2015(10):43-48.
- [15] 徐宗阳. 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6(5):63-87.
- [16] 刘磊. 农村分化背景下富人治村的类型及其影响[J]. 人文杂志, 2016(12):110-117.
- [17] 贺雪峰. 当下中国亟待培育新中农[J]. 人民论坛, 2012(13):60-61.
- [18] 杨华. “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命题[J]. 开放时代, 2012(3):73-89.
- [19] 王海娟. 资本下乡的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41(4):47-54.
- [20] 李祖佩. 项目进村与乡村治理重构——一项基于村庄本位的考察[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4):2-13.
- [21] 杜鹏. 社会性小农:小农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基于江汉平原农业发展的启示[J]. 农业经济问题, 2017(1):57-65.
- [22] 陈文琼, 刘建平. 家庭发展秩序:非精英农民城市化的核心机制——家庭视角下江汉平原的农民城市化[J]. 公共管理学报, 2018, 15(2):69-81.

[23]刘锐. 富人治村的逻辑与后果[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90-98.

[24]黄宗智, 高原, 彭玉生. 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 中国的农业发展[J]. 开放时代, 2012(3):10-30.